

联 合 国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A/41/695
S/18390

9 October 198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FRENCH

大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25、76、88、97、99

柬埔寨局势

进行国际合作以防止新的难民潮

普遍实现民族自决权利和迅速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

对于切实保障和尊重人权的重要性

有关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安全理事会

第四十一年

1986年10月9日

民主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谨附上关于越南占领部队在柬埔寨推行越南化的一份文件，供你参考（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25、76、88、97 和 99 的正式文件及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散发为荷。

常驻代表

秀蒲拉西（签名）

86-25338

附 件

柬埔寨境内的越南化

“柬埔寨境内正在进行的越南化过程必须是国际关注的重点。”(*)

* * * *

半个世纪以来，河内当局阴谋策划，企图吞并柬埔寨，组织“印度支那联邦”(**)，并逐步消灭柬埔寨的民族特性。这种做法与其祖先于十七世纪吞并占婆伊斯兰王国——即现在的中越南和于十九世纪吞并南柬埔寨（湄公河三角洲）——即现在的南越，如出一辙。它们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疯狂地推行其柬埔寨境内越南化的政策。

下面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博物学家兼人种学家玛丽·亚历山德里娜·马丹女士在《研究评论》（1986年2月）发表的文章摘录。

(*)： 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在曼谷（泰国）举行记者招待会——1986年8月6日星期三。

(**)： 参看联合国1985年9月24日第A/40/678号文件，题为“柬埔寨的越南化：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并吞”

柬埔寨境内的越南化

1982年秋，越南国民移植柬埔寨成为合法化。根据可以在曼谷查阅的官方文件和1984年初从难民方面搜集的证据，对此事所涉的范围可以提供一些线索。这只是一个全面过程——即柬埔寨境内行政、教育、经济、军事和政治等各个领域的越南化过程之其中一步。一年后情况如何？

行政和教育

当时越南专家人数倍增的情况目前似乎蔓延到柬埔寨境内各个地区。在他们日益广泛的监视下，高棉公务员越来越感到愤慨，共同相处虽有六年之久，高棉公务员仍然纷纷弃职而逃，因为这种共处方式不仅在和平时期难以实行，在被占领时期更是无法忍受。一些公务员还有其他理由弃职而逃：他们很可能以与抵抗组织合作的理由，被关进监狱；对其他人来说，越南人的压迫是他们逃跑的主要原因。高棉人拟订的活动项目在送交共和国[*]总统和总理审批之前须经越南专家的检查、更改和作最后决定，浮屠节庆典也须征得主管文娱庆典事务的越南顾问的批准。在越南专家总办公厅中（又称为第A50号办公厅），掌管党务的专家才有最后决定权。他的权力比执行越共命令的办公厅厅长黎定（胡志明市前任市长）还要高。

除了两类特殊人物（被视为国家财产而接受适当训练的孤儿和在越南、苏联及东欧国家接受教育的人），公务员的挑选和进修十分严格，主要是根据其对政权的拥护程度为标准……。除此之外，高棉人对一种新生的现象感到担忧：从前移居柬埔寨并会讲高棉话的越南青年，现已纷纷申请担任公务员的职位。由于移民入籍问题已在考虑中，而高棉人逃离柬埔寨所留下的空缺需要填补，因此，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切合实际的。但是，高棉人大批离去却是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在共

[*] [越南军队在金边所设的傀儡政权]

产党接管之前，大多数有教育的高棉人都渴望以行政工作为其终身职业。从他们的愿望可以看到，他们的信心一定是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才会对政权如此反感。

在这种新的困难面前，抵达边境的学童都是手足无措和徬徨无措。有些学童竟然盼望在边境能够找到大学。他们有很强的求知欲，有些人选择逃跑的途径，因为最近金边决定将他们的教育水平限制于中学程度，以便把他们征募入伍，或送给“开垦”队⁽¹⁾。这项决定是1985年初高棉教育部官员在越南顾问面前告诉他们的。不用说，学生们对此大感震惊。除此之外，指定的教育课程不够完善，每个学生都对此感到遗憾：他们每天上课时间只有四小时，其余时间用于“社会主义劳动”，1984年开始，他们被逼学越南话。柬埔寨历史课程已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现代史课程代替（在越南编制的高棉文书本），其中歌颂高棉—越南之“悠久”友谊：高棉人民和越南人民一向友好，争执只存在于双方领导人之间。看来似乎高棉人对其邻国的痛恨只是一种假象，没有历史根据。必须指出，这种痛恨心理并不普遍针对越南人民，而只针对那些以各种手段觊觎高棉领土的人，即过去的安南皇帝、独立后的南越领导人和军队以及今天的共产党领导人。1985年，高棉人与越南移民之间发生的冲突，归因于越南移民依仗其本国的保护，以征服者姿态为所欲为，以致超出了柬埔寨人所能容忍的程度……

(1)：“开垦”，“强迫劳动”，指越南军队征用柬埔寨平民。参看联合国1985年10月14日第A/40/750号文件，题为“越南在柬埔寨所犯的种族灭绝罪行：消灭柬埔寨人民的新方法”。

移民者和边界

难民行动都是一致的，凡在现况不安全的地区，1983年和1984年越南平民的人数就差不多没有变化。然而，1984年，新难民潮不断涌入同越南接界的市镇和省分，和沿水道一带。

现在，已有500户越南人民住柴桢省巴韦。在波萝勉省从巴南经过乃良到边界的一带，即多河及其支流两岸的地区，越南渔民已占人口的大多数。任意穿越边界的商人在公路上来来往往（特别是第1号公路）。

一般来说，移民占据大城市的市场。1984年底，在金边举行了类似人口普查的调查，以便查出“不事生产分子”，也就是公务员以外，所有应当被送往稻田劳动的人。不肯同该政权合作的人和小商贩也属于这一类。然而，困难愈来愈严重：在市场上，1980年仅征税100瑞尔的1.2米摊位，到1984年摊主竟要每月承担2,800到3000瑞尔费用。如果在家里设摊，就必须每月缴付400瑞尔。高棉人认为，这些措施是旨在迫使高棉平民离开金边的总计划的一部分。实际上，很少人付得起这么高的税。此外，人民只准许居住在中国式住间内，高棉式住房和现代化大厦则保留给移民居住。1984年，移民不断涌入，人数在5月间达到高峰。高级公务员报告说，〔如同难民去年的报告〕大群移民在夜间抵达，不让高棉当局知道。首都革命人民委员会的有关部门必须在夜间开会，立即向他们分派职务，以免外国人注意。如果说居民短期内未发觉有移民抵达，当他们看到越南人住的新房屋后马上就可以发现情况。这些建在废地的房屋，几天前还是空的。1985年春，住在金边的人干脆被赶走，让越南人住进来。他们被送往农村，其中有些人逃走后，跑到边界。上次人口普查后，发下新的身份证，并经常进行核查和搜捕。因此，凡此种种都是有计划的，以便逐渐把金边变成越南的市镇，只留下必要的高棉行政人员…

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1983年签订的边界协定已立即予

以执行：有人现在已在从柬埔寨夺取的海洋领土进行石油勘探。在这方面，Bodoi（越南士兵）禁止人们下海。至于陆地边界，在1978年底越南开始进行侵略的时候，住在柴桢、波萝勉、磅湛各省的人民就亲眼看到有人把界碑移进柬埔寨3至5公里处。配有拖拉机的越南平民筑起一堵竹篱栅栏，作为新边界的标志。

1975年以来，被迫把一半土地交给来自北方的越南人，柬埔寨南方（前称交趾支那）的高棉人也对这种殖民行径极为愤恨。经济和宗教骚扰、政治迫害（监禁）同经河内重新划界并称之为“新柬埔寨”境内所用的手法十分类似。因此，1984年起，越南南部的高棉家庭逃离家园，到达高棉—泰国边界，男子都加入民族主义抵抗运动的队伍。“我们高棉人不愿同越南人为伍，我们想法不一样”。实际上，问题不仅仅是觊觎一块领土，而是边界两边的整个种族集团都眼睁睁地变得束手无策。

高棉人更加担心的是：他们认为，有许多军人伪装成移民。万一正规部队真正已撤退，就比较容易进行活动。洞里萨湖的越南人拥有武装，可以自卫和抵御红色高棉的攻击。这件事实证明，如果必要，这些平民知道如何使用武器。

经济控制

1. 国际援助

1979—1980年，分配情况十分荒谬：每人每年仅分得大米或小麦或玉米0至10公斤。此后，抵达边界的难民，不论是来自农村或市镇，都得不到任何配给。不论提供给援助有多少，看来根本没有送到人民手上。除此以外还有本国和外国军队（金边傀儡军队和越南军队——编辑注）要养和难民圈中经常流传的移作他用的情况。

援助用品一般储存在省会的农业部或商会，和其他地方。韩桑林部队的逃兵过去常常护送载满商品驶往越南的越南军车队；边界警察人员查对海陆货物的内容，因为特别是在涨水期，也利用水路（湄公河、巴萨河）运货。在通往胡志明市的

公路上，居民看到一列列遮盖的重型货车，使人联想起1960年代运载大米供应越共和北越人的车队。此外，他们认为，金边当局从1979年起就存心切断桔井—腊塔纳基里公路，以便掩饰送给柬埔寨的国际援助有一部分被转运至越南的行动。由于每一个市镇都实施宵禁，车队在夜间离开渡口不长的东部各省就不会被人看到。儿童基金会赠送的书籍、笔记本、铅笔，和肥料都在柴桢和波萝勉省的市场上出现。只要想到一袋尿素（由援助方案供应，再在市场上转售）在柬埔寨卖50瑞尔，而越南短缺肥料，那里的价格高出十倍，我们就可以了解沿边界一带每天都有的交易，而不见得最贫困的“走私贩”（整个区域都用它来称呼在边界做生意的人）就攫走了利润。

2. 国内产品

柬埔寨和越南省份在经济上的连体使两国得以进行交换，柬埔寨人认为这种交换是有利于河内的。

分配给人民的大米定量很少，这一点至今还不为外人所知。首先，应该知道，应根据被称为 Krom samaki 的生产小组中每个成员的生产力，有时则根据每个家庭的人口多少来分配粮食。这就意味着，如果家里的户主不在（丈夫被集中起来强迫劳动或孩子应征入伍），即使不会闹饥荒，生活也十分困难。一般来说，每个家庭（在更少的情况下是每个生产小组）仅能得到一小块土地：农民“拥有”他原来耕种的土地的三分之一或一半，即0.5至1公顷。除此以外，据逃避文职所报道，正在执行1984年初增加的税收：农民只得保留分给他的水稻田的50%至70%；在地方上，数字也许更低，很少会更高。一般来说，作出扣除后是没有任何补偿的；这是捐献。据报道，在一些地方，国家对一公斤稻米支付1.4至1.6个瑞尔。由于考虑到这些限制（土地和粮食），每个人平均每年可得到100至130公斤大米（一个农民通常需要250公斤大米）。为弥补这一短缺，人们就动脑筋赚钱，因此争先恐后地做生意，卖熟蔬菜、糕点和柴禾，这些生意人都是农民；因

此城镇周围和边境地区的生意使商人赢得一些利润，也使很多家庭得以生存下去。短缺的大米可在市场上自由购买：根据质量卖5至8瑞尔一公斤。在1984年下半年，暹粒省博的大米价格上涨，卖到每公斤10瑞尔。

如果一个农民杀了一头老了不能耕种的牛，他必须向驻扎在本地的bodoi(越南士兵)上缴3,000瑞尔；一头猪必须要交给他们60瑞尔。种植一棵香蕉树抽税5瑞尔，一根甘蔗3瑞尔，一个椰子(摘了自己吃)1瑞尔。至于沿湄公河河边种植的蔬菜，必须有三分之一捐献给国家。

所有这些商品可能都给高棉和越南士兵食用了。此外，据居民说，一部分柬埔寨产品在交流方案的基础上送往越南，这些售价很低的产品是为了以高价交换越南的商品，高棉人丝毫不欣赏这些商品的质量。

虽然柴桢和隆安(越南)结成了姐妹，可是只有30%与越南交流的产品是送往隆安的，其余主要送往胡志明市。1984年在柴桢省征收23,000吨大米的数字也许可证实，曾几次提出，1984年柬埔寨送往越南的大米总数是200,000吨这个数字。即使尚且不谈这两个数字，人们也会问，为什么柬埔寨这一前大米出口国(每年多余200,000至400,000吨)在经济改革六年后的今天仍不能养活她的人民？为什么柬埔寨农民为了养活一家人，尽管得到援助(1984年需要177,000吨大米)，仍不得不到市场上去购买比官方比价昂贵得多的大米。那么《河内电台》于1985年6月17日播送的一条新闻(85年6月19日FBIS)的含意是什么呢？它说：“1984年前9个月，柬埔寨贸易部门从全国各个省份购到400,000多吨的稻米”。但是公报并未具体说到谁是购买的受益人。

此外，从磅湛省橡胶园内得到的大部分橡浆在加工成绉胶后都送往越南。《河内电台》于1985年6月16日(1985年6月16日FBIS)报道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在橡胶开采领域里合作十分出色。

除这些主要贸易外，非常贫穷的南越农民到柴桢和菠萝勉来寻找物品，人们称

这些物品是柬埔寨人丢弃的垃圾，即破瓶子、塑料、破铜烂铁，……就这些小型的易货贸易而言，高棉人并不对这些越南家庭表示不满：“他们那么贫穷，他们不是抢劫者；在交换时他们甚至想支付些现钱。”但是高棉人指责（越南）领导人为不诚实的人。1984年11月25日，分别为柴桢省进出口部（高棉）主席、副主席和会计部主席的占·桑、索尔·登伊、蒙·西塔被指控为贪污，被逮捕后送往通常关押政治犯的柴桢地下监狱。一些柬埔寨人证实，由此被越南专家窃走的瑞尔达29,000,000，他们解释说，支票定期送往越南……来自金边的工人说，由bodoi看守的仓库里的设备和机器失踪，专家们起草的报告则指责高棉人是窃贼。

人们对这一迫害作出了广泛的反应，当前，高棉农民已深深卷入这一冲突之中。

3. 农民的政治信仰及高棉士兵的逃跑

越南在韩桑林军队的协助下，对柬埔寨进行了河内战略家们原认为只是一次闪电行动的军事干涉的六年之后，仍无法平定柬埔寨。1985年年初，他们攻下了沿泰国边境原为反抗者所占据的所有基地，取得一次“国外战线”上的胜利。不过，在1982年6月成立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后，“国内战线”上的战事越来越多。农民倒向西哈努克亲王，目前正在协助反越政府的三个运动。农民的这种政治信仰是高棉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

全国各地的政治犯监狱越来越多（金边在1975年以前仅有一所，现在已有12所），从这些监狱生还出来的人从1980年起就逃难到边境地区；给住在洞里萨湖的越南平民获得分发步枪；金边电台时有发生战事的报道；金边和河内所宣称的反抗者的重整集结；建筑战略围栏以及强迫劳役——这些情形清楚说明了反对该政权的人很多……

河内所望达成的军队高棉化并非易事。难民们指出，韩桑林军队中有过去住在柬埔寨的越南国民。难民们说，这是旨在使军队越南化的一个掩饰手段。并且，逃兵们指出，占领者对柬埔寨兵士没有信心，因此把他们大部分派去搞公共工

程、挖掘战壕、种菜、砍伐建造碉堡的木柱等工作。他们大部分在过去五年中均未参与任何战斗……

人民的冷漠——一种如非惧怕受到骚扰就几乎不加掩饰的敌意，有时被越南人查获到的对反抗者的支援，以及因而使部队在国内所面对的困难，都使河内必须采取严厉措施来设法制止抵抗的扩大。

在强迫劳役下的人民*

这种大规模征募行动悄悄地进行了一年多，仍未被法国报纸发现而大肆报道，直至参加动役的柬埔寨人抵达泰国边境，同时又受到新闻报道的重视。泰国报纸早在1984年10月就曾报道这种行动，并且自1985年1月以来经常见报。应该指出的是，征召农民已经进行了两年半，但在1984年1月征集行动正式化（由 Say phu Thang 签署通知）以前他们都未曾反抗，自此以后才开始向国外逃亡。主要是公务员开始受到影响时才把这项消息反映出来。

这些劳役是旨在支援军事行动，即清伐森林以赶走潜伏其中的反抗份子、修筑公路、建造围栏和壕沟（自老挝伸延至泰国湾）来封锁边境以防止游击队渗入。最恐慌的是那些可能被征召的人，主要是18至45岁的男子、无需照顾婴儿的18至35岁妇女和假期中的学童。到8月中时，甚至连高级公务员都受到影响。

金边政府对此未加否认。……鉴于在首都接受疟疾治疗的人数众多，今天该政府已无法再掩饰这种动役的后果。这场灾难的规模似乎为政府当局意料不及。但是强迫劳役仍在进行，虽然征召的速率在雨季中有所变化：征召期限已自三个月减为两个月。不过，由于征召的人数保持不变，这意味着更多人的生命在受到威胁。1985年10月间，征召的速率应已回复到旱季的情形。保健人员、护士、医生被派往这些缺医少药的劳工营或邻近城镇中的医院去工作。由于缺乏奎宁或有

* 参看1985年10月14日联合国A/40/750号文件：“越南在柬埔寨所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消灭柬埔寨人的新方法。”

效的此类药物，本来可在早期加以控制的疟疾发作已造成了严重的人命损失。而且，并不是所有被征用的外科医生都能处理地雷爆炸所造成的截肢手术或重伤，而森林里到处是地雷，若非有适当的器具是无法探测到其引线的。结果，各省的和金边的医院原已不足的医疗人员再被削减，而派去从事一项他们并无能力担任的工作。

另一方面，种稻的农活也受到了不利的影响：那些被抽去从事强迫劳役的人——即身体健壮的男女……完全不能或极少能参加农业生产。1984年，粮农组织宣布该国的稻米不足量多达177,000吨（《世界报》，1984年10月21/22日）。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詹姆士·英格兰姆先生估计1985年的不足数为400,000吨（《民族评论》，1985年6月13日）。一部分原因是气候不良，但从合理的推断，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越南军队征用了从事农业的人力。

对高棉人极其不利并危及其经济，但却对越南人非常有利的是，他们将最巨大的树砍成木材送回越南。这种强迫劳役对该国的自然资源有很坏的影响：柬埔寨一向成功地保护着其森林（1969年占全国土地的73%），但现在即将失去其最美丽的品种之一，如果森林砍伐过甚，生态状况也可能发生变化（雨量减少、某些动物绝种或变得稀少）。1982年以来，硬木林和竹林有很多品种被砍伐，用来在反抗分子常去的村落（北部和中部各省）以及重要军事总部所驻的城镇（马德望、暹粒、菩萨地区的列）四围建造战略性围栏。
